

最新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 孔子教育思想 读书心得(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一

- 1) 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 2)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3)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 4)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 5)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 6)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7)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 8) 放于利而行，多怨。
- 9)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 10)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11)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12) 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3)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14) 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5) 贤哉，回也！

16)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17)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18)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19)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20)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二

假期里，再一次拜读了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走向生本》，使我在思想上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生本教育体系的理念就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它是一种能让师生产生快乐的“灵丹妙药”，从而让学生喜欢学习，教师喜欢教育教学工作。郭教授在《教育走向生本》中说：“快乐的感受是人更好学习的情感基础。快乐的日子使人聪明，使人产生心理的兴奋和生理的活跃。在兴奋中，他会获得最高的学习效率和最好的学习效果。”当一种教育为孩子、家庭、学校、社会带来了快乐与幸福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它呢？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指导者和主持人的角色出现，使学生完全发挥自己的学习潜力。生本

教育最主要是注重教学的交付，教师尽快地让学生自己活动起来，去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把可以托付的教学托付给学生，它是一种依靠学生、为学生设计的教育思路和教学方式，它要求教师在课堂中努力创设一个优良的课堂气氛，把学生的个性、想象、创造的潜能开发出来，给学生自主学习权利，发挥学生的个性，允许学生根据学习需要，或独立学习，或小组合作。

我们一定要转变教育观念，变“师本”为“生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一个引导者，而且也要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引领学生去生产知识，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给学生过多的干预，给他们学习尽可能多的自主，最后让他们成功地解决问题。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而孩子一旦全情投入，那收获一定是丰硕的。

“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和规范，是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范畴。“仁”的含义，《论语》中多次提到，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等。“仁”为众德之首，而作为最高准则，孔子的“仁”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先天的道德范畴。《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仁”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是绝对不行的，从而“仁”成为先天的道德精神。

其次，是主观的道德修养。依孔子之见，“仁”是天赋道德，故小人中不会有仁人，君子当都是仁者。然而，现实却会有相悖现象，所以能否达到“仁”又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所以，孔子又谈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有能一日

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等。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思想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的德育标准和目标。

“孝”和“悌”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这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仁”的学说，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这也正是我们德育的首要目标。

孔子强调德育，并且把他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其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孔子在认识论方面虽然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其本人也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第二，孔子强调道德信念与意志的培养。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第三，孔子强调“行”的重要性。孔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的”不能离开“行”。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孔子在毕生的德育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第一，志恒。孔子在德育过程中，要求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并且要立志有恒，进行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立志就要不怕吃苦，不能追求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不应追求眼前小利，造成半途而废，悔恨终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孔子为宣传自己的学说，为天下太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选择苦难之路，一生不变。

第二，律己。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孔子言传身教，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自己先做到了，自己的学生必然也会做的较好。自己做不好，又怎能要求别人优秀呢？“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第三，扬弃。道德的规范就是公共的社会契约，德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过程。人要修德、讲学，否则，会令人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有错非但要不怕别人知道，而且要决心改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他反对有过错而不改的做法，“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论语·卫灵公》)。他有特别强调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不断地自我监督与反省，“克己复礼以为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同时要勇于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对别人的良性发展，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修养，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之修为，实施德育之目标计划仍为良策。

第四，爱生。今天讲求遵守师德，不体罚学生，其意无外乎是爱生。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对待学生，坦率真诚，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与弟子情深似海，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被刳成肉泥，孔子闻耗，在院子里仰天恸哭，其情动天地。孔子爱生如子，其德也高，其情也深，所以深受弟子敬爱。他去世后，学生们为其守坟三年，而子路还是不肯离去，又守了三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春秋末期，在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动荡时期，孔子以其丰富的德育思想和毕生的实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局面，为后人披荆斩棘，杀出了一条德育的道路。他以渊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培养出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这在当时和以后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地位。

孔子的德育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可穿越时空的界限，其德育思想和方法，今天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并进行发展，吸收借鉴先进合理的部分，充分改造利用，从而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保证社会主义道德在吸收传统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三

国家教育部发出《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至今，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已经过十六、七载探索，期间有宝贵经验的积累，也有实践误区的困惑。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特别重视。

其一，学科教学观念的陈旧。

小学思想品德课具有鲜明的方向性和时代特征，其教学内容既有优秀传统的继承，也有时代精神的体现。思想品德课教学是“编、教、学”的理念的综合体现，思想品德课教师，必须树立“编、教、学三位一体”的学科教学观，在掌握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小学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及教材的特点和要求，准确把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规律，真实了解学生学习本学科的意愿，并以此为依据来设计课堂教学。首先，要理解教学内容的连贯性与渐进性、思想品德教育的时代性与针对性、规范方式的实效性与可操作性等，这是教师优化使用教材的基本要求和前提。第二，在传统教学中，思想品德课一直固守“明理——激情——导行”三环节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固然有它的明显优势，但过于单一的模式必然会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锐减。80年代以来，我国教学模式研究发展迅速，仅1993年冯克诚主编的《实用课堂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全书》就收集了近六百种教学模式，其中有不少对思想品德课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受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小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愈来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心态，因人施教的难度也愈来愈大，真实了解学生学习的共性和个性，已经成为教师课前准备的重要内容。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教学观念还未得到根本转变，以偏概全，以抽象代具体，以经验代现实，不重视课程理论和学习理论的现象依然存在。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等基本理论缺乏和“编、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意识淡薄，直接导致了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的狭隘性、教学过程的单一性和课堂教学价值的短效性。

其二，教学主体的失落。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因素的有效影响，促进小学生将思想品德规范逐步内化为自觉性的过程。这一内化过程的核心是主体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和发展。因此，思想品德课教师必须树立主体教育思想，深入研究主体性水平发展策略，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课堂改革向纵深发展。思想品德课教学应有三个主体，即教师、学生、班级集体，这三个主体分别居于课堂教学的不同层面，共同构成以实现教学目标为中心的立体结构。教师主体在最高层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主体在基础层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班级集体在中间层面，发挥主力作用。构建教师、学生、班级集体三主体相互作用、彼此互动的协调运行机制，将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动作用、班级集体主力作用有机融合，必将形成思想品德课教学强大的内驱力，充分激发思想品德教学的生命活力。然而，在教学行为中，有的思想品德课教师主体意识相对淡薄。重视教师主体，却有意无意夸大教师主体作用，在教学行为上，把学生生动的理解变为呆板的灌输，把师生双向互动变为教师单向传递，把课堂变为“一言堂”，把教学简化为教的实施而忽略学的引导；在教学评价上，不是关注学生学得怎么样，而是关注教师教得怎么样。口头上重视学生主体、实践上则把学生变成抽象的主体，视教学中学生活动为点缀，把激发学生主体作为“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手段。漠视班级集体对学生个体的凝聚力、驱动力和同化力，忽视对班级集体良好主体精神的培育，把“面向主体、面向发展”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真实主体的失落，必将导致课堂教学价值的失落。

其三，教学价值观的偏差。

思想品德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构成，其课堂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的、整体的思想道德知识、观点、行为规范和能力要求；二是蕴含于知识、观点、行为规范、

能力要求等的思想方法。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思想道德知识、观点的掌握和行为、能力的养成视为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显性价值，而把思想方法的启蒙和奠基视为思想品德课堂教学的隐性价值。成功的思想品德教学，应该是双重价值的发展。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人们却更多的把目光投向显性价值的发掘，片面地追求明理、激情、导行的效度，以达到“认知”、“行为”两个层次的要求为终极目标。对于思想方法的启蒙和奠基，对于隐性价值的发掘，思想品德课教师既缺乏足够的研究，也缺乏足够的重视。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价值的偏差，是教育功利思想的一种表现；对近期显性效益的热情关注与长期隐性效益的相对淡薄，则构成了深化教学改革的一道障碍。

小学思想品德教材编写要求实、求新、求活，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也要求实、求新、求活。树立科学的学科教学观念、建构以发展为主体的学生观和完整的教学价值观应该引起深刻的思考。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四

摘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因材施教仁教学思想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

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

受教育的权利。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 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 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 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 and 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论文期刊：

[3]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1期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五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他的美学思想你有知道多少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孔子的美学思想

孔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中国古代的大圣人。中国的古代圣人很多，但是最有名的是八大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八大圣人。这八大圣人中孔子是最后的一个，也是地位最低的一个，因为其他的圣人都是帝王，周公虽然没有当过帝王，但是也当过实际上的执政者。孔子不仅没有当过帝王，连小官也没当上。

说白了，他跑来跑去，周游列国，想要当官，结果什么官都没当上。因为他当不上官，他只好收几个门徒，靠私家讲书来维持他的生活，这给孔子带来了很多好处。第一，他走向了民间，懂得了民间的疾苦；其次，他因为私家讲学，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的局面。孔子不仅成了中国第一个私家讲学的人，他还开创了第一个显学“儒学”，成了中国的“万世师表”。在从政方面，孔子是失败了，但在著述方面他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以前中国的学术是伟大的，在这基础上他开创了以后的中国的学问。

司马迁在写孔子思想的时候，对孔子赞不绝口，他这样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中国的帝王很多，有学问的人也很多，但都是活着的时候了不起，死了也就没什么了。

而孔子则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传了十多代，天下有学问的人都尊奉他为师，所以孔子才真正称得上圣人，是至圣。孔子这种至圣的地位，二千多年以来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是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他真可谓是一个大圣人，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珍惜中华民族的荣誉。孔子伟大的思想，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研究与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像孔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看他的美学思想，先要看他的人生态度。孔子的人生态度，有一段话可以说明。人家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段话说明孔子一方面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失意了就比较消极）；另外一方面，孔子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一生不得志，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理想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处处碰壁。他自己说道：“向吾适宋之卫，困于陈蔡，累累乎若丧家之犬也”。

虽然他到处碰壁，但是他仍然乐观。他自己说他“乐以忘忧”，在快乐之中把忧愁忘记了，他不要忧愁，要的是快乐，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他在陈、蔡被围，仍然“弦歌不绝”。他的大弟子颜渊生活很苦，孔子赞美他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生活很苦，旁人觉得他应该很悲苦，而颜渊却很快乐。孔子既然赞美颜渊，就说明他非常欣赏颜渊在穷苦的生活当中仍然过得很快乐的生活态度。

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子们谈志向。有的说我要做官，有的说我要发财，有的说我将来要做“小相”，就是我们现在开会的“司仪”，对这些孔子都没表示赞同，他最赞同的是曾点的志向，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曾点的这种以审美的态度来游玩观赏春色的志向，非常赞同，这说明孔子喜欢快乐乐观。他自己喜欢音乐，一生差不多是音乐欢乐的一生，听到美妙的音乐《韶乐》，就“三月不知肉味，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他看到一个婴儿，天真烂漫，眼睛大大的，就非常高兴，形容这个婴儿“就像《韶乐》”。

这些就是孔子的美学思想。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指篇六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崇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弑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

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谟》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诠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

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一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一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旦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

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 圣人观之利一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已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

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 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

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进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